



末法与灭法：房山石经的信仰背景与历史变迁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 2021年第4期 发布日期: 2022-01-03 浏览次数: 109

末法与灭法：房山石经的信仰背景与历史变迁

作者: 刘屹,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 房山石经的刊刻与佛教末法思想密切相关, 已是学界公论, 但房山石经事业的信仰根基, 又不仅限于末法思想。静琬是在承认隋末唐初已入“末法”的前提下开窟刻经, 但其主要目的并非为防备世间帝王未来的“灭法”运动, 而是要留存经本给“末法万年”结束以后的人们。从其后继弟子开始, “末法”意识对房山石经刊刻所起的作用逐渐下降。历代参与刻经的各阶层人士, 主要是为求得个人功德果报, 离静琬刻经初衷越来越远。房山石经并非忠实贯彻静琬刻经理念的结果, 而是由不同时代、信仰参差的各界僧俗, 按照不同信仰需求, 自发构成一个信仰实践共同体来完成的。

一、静琬刻经的思想依据

佛教刊刻石经的最初动因, 应该只是对中国“镂之金石”传统的模仿。强调石经的永恒性, 原本并不是出于对世间将会再次发生“灭佛”运动的危机感, 而是要在佛法最终面临消亡, 或是发生劫期轮替、天地沦坏时, 世间还能存有这些石刻佛经供信仰者传习。

静琬刻经动机多了鲜明的“末法”意识。静琬原本是在佛教历史观和宇宙论背景下, 发心立誓成就一个“大誓愿”。他设想这些石经派上用场, 不是在他所处时代, 也不是在未来千百年内, 而是在整个“正像末三时”都结束之后, 到未来佛弥勒降世之前的漫长年岁, 这才符合他所接受的末法思想。因此, 静琬的发心本是一个堪比“愚公移山”的“大誓愿”: 以个人微薄之力, 为千秋万代之后人世间存续慧光, 建功谋福。

二、刻经动机的多元理解

目前所知静琬刻经之事的最早记载, 是隋代《范阳图经》, 且对于静琬发心的目的和意义并未过多着笔。较早且比较详细的记载, 是永徽四年(653)左右成书的唐临《冥报记》。《冥报记》记载静琬之事, 主要是说其刻经事业大有福报。

《冥报记》用“法灭”一词, 并非静琬刻经题记中的原话。唐临虽然未必完全理解静琬所接受的“法灭”新观念, 但他说静琬刻经是“以备法灭”, 还不能算是误解静琬初衷。

唐临之后, 道宣在麟德元年(664)完成的两部著作《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大唐内典录》中, 都记载了静琬的刻经活动, 史料来源很可能都是唐临《冥报记》。唐临、道宣都没有明言静琬刻经与未来佛弥勒信仰的关系, 而弥勒佛出世的前提是释迦佛法的“法灭”。明准是唐贞元至元和年间长安僧人, 他指出静琬刻经的目的, 是着眼于未来佛弥勒降世。但在刻经不是为眼下或未来千百年间的世人使用这点上, 静琬、道宣和明准的看法应相同。

静琬于贞观十三年去世, 其后有四代弟子——玄导、僧仪、惠暹、玄法, 先后继承其遗志。石经山刻经事业持续到开天时期才告一段落, 唐末曾一度重新兴起, 后又归于停滞。后晋天福三年(938), 石经山所属的涿州被并入辽朝疆域。辽君臣子民对石经山刻经事业复兴, 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不过, 刻经事业虽然迎来新高潮, 但人们对静琬刻经初衷, 却从本质上产生了误解。

正是从辽代开始, 人们对静琬刻经事业看似感佩追随, 实则曲解加深。到明代, 即便佛教高僧也对静琬刻经之事颇多讹传。不惟明人如此, 今之学者也多作如是观。辽代人未必真正了解静琬初衷, 他们把静琬的誓愿, 从利益万年之后的万代苍生, 拉回到眼前几百年的纷繁俗世。现代学者认为静琬是为预备不知何时会再次来临的“灭法”才刻经封藏, 更是一种脱离相应历史语境的误读。

三、刻经事业的社会基础

在刻经事业中布施的各阶层信众, 不会都像静琬一样关注“末法万年”以后的世界。他们资助刻经, 更多是为帝王、家族和个人解决眼下问题, 积累来世功德。当然, 静琬之所以发此“大誓愿”, 肯定也有为自己积累功德之意。刻经活动吸引来各式各样的佛教信众, 他们纷纷在石经山刻经题记中留下自己的功德愿念。正是这些带着各种现实利益需求的功德愿念, 逐渐与静琬开创刻经事业的初始轨道产生偏离。

静琬时代，可能不会听任布施者随意刻写发愿文来表达各自愿念；但到玄导时代，虽然大体上继承了静琬刻经遗志，却很可能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得不向世俗社会作出妥协，即要允许赞助刻经事业的信众在石经完成后，刻写发愿文，以刻经功德来换取现实福祉。

社会各阶层的发愿要求，不外是为亡故家人祈福、祈愿合家平安、祝愿父母长寿，也有因得病而祈求尽快痊愈等，不一而足。很可能早在玄导住持的时代，石经山刻经事业就已经开始为迎合世俗佛教信徒，而背离了静琬的“大誓愿”。玄导或许是出于现实考虑，放任了个人化和世俗化的刻经造像来换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一旦刻经事业掺杂了这些世俗利益要求，就只会离静琬刻经的初心越来越远。从此，刻经活动不再是为“末法万年”之后的人们留存纯正可靠的经本，而更多地变成现世信众谋求个人福祉的手段。久而久之，静琬刻经的目的和意义就被完全忽略甚至改造了。

自辽代开始，“法灭”时间被模糊化，辽人已不再从未法思想去看待石经山刻经事业。“末法”意识在静琬之后开始减弱，乃至到后来几乎不再有人提起。究其原因，至少可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末法”始年被人为推迟。第二，未来佛弥勒信仰的淡化。第三，中国佛教对“末法”问题的关注度持续降低。

结语

静琬发出“大誓愿”，是为“末法万年”之后的人们保存经本。静琬与社会各阶层信众投身刻经事业，有着共同信仰基础，即都相信佛教基本的轮回果报理论和功德观念。只不过静琬心中有对“末法万年”后人世的关怀；而现世众生大都只关注如何解决眼下的实际问题，或是通过现世功德为来生求得福报。其间的根本性差异，并不在于信仰实践的高尚或平凡，而在于中国佛教自身发展中的某些阶段性和分层性特质。房山石经至少体现出三种不同的刻经目的和实践。静琬时代，他选刻自认为最重要的经典，想用最具有封闭性的观念和手段，留存给万年之后的世人。他所刻经典的选用标准、封藏形式和实施过程皆以个人理解为主导。玄导时代，将刻经选择权开放给普通信众，且不再追求石刻经藏的纯粹性，使得刻经与写经、造像一样，变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追求功德的新手段。到辽金时代，刻经动机转为形式上继踵前贤，而实质上是要将尚未完备的大藏经刻满、刻全，以求功德圆满。与此同时，满足普通信众的功德愿念，仍然是刻经事业的重要社会性功能之一。

总的说来，刻经事业不同阶段的主事者，都是根据各自所处时代背景，对造经目的和依托理论提出不同的修正。房山石经的最终完成，很大程度上是各时代主事者因时、因势利导的结果。如果把房山石经看作是一个历经千年最终形成的“文本”，静琬只提供了这一“文本”的原初形态，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经后世不断调整和修正后的“历史文本”。在此过程中，持有各种不同信念和追求的人们，以“刻经一功德”作为彼此相通的认知基础，同时也是超越时代界限的核心价值，形成一个佛教信仰实践的共同体，造就了房山石经的千古传奇。

从房山石经历史发展来看，末法思想并非笼罩全部刻经历史。“末法”意识实际影响或许只存在于静琬之世及辽代极少特例之中。从静琬刻经的初心很可能被后世逐渐误解这一事实来看，“正像末三时”俱全的末法思想，是一个中国佛教自创、颇具实用性、可相对灵活解说的理论，只在特定历史时期成为佛教的热切关注点。房山石经中“末法”意识的隐显，可以看作末法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上兴衰历程的一个缩影。

文章摘自《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原文约34000字。

上一篇：[蚕神献丝与三蚕圣姑——明清时期蚕神信仰文化中的“晋南故事情节”与习俗传统](#)

下一篇：[传说与历史：并肆地区的北魏皇帝遗迹](#)

-----友情链接-----



----- 党群组织 -----



----- 行政部门 -----



---- 院系部门 ----



--- 其他链接 ---

